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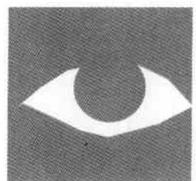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文丛

从西方环境运动到西方生态主义政治
西方生态主义的基层民主理念
西方生态主义的非暴力政治参与理念
西方生态主义的生态优先和社会正义理念

Basic Political Ideas of Ecologism in the West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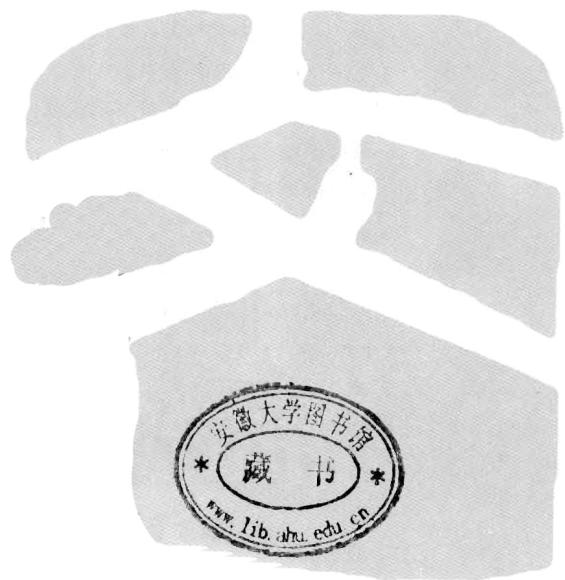
金纬亘/著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Basic Political Ideas of Ecologism in the West

金纬亘/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 金纬亘著.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11.12

ISBN 978-7-210-05159-6

I . ① 西 … II . ① 金 … III . ① 生态学 - 政治思想史 - 西方国家 - 现代 IV . ① D09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4498 号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作 者：金纬亘

责任编辑：徐明德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xmd66@126.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1.5

字 数：250 千

ISBN 978-7-210-05159-6

赣版权登字—01—2012—2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36.00 元

承 印 厂：南昌市印刷九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从西方环境运动到西方生态主义政治	—	30
第一节 从新社会运动到生态主义运动	—	30
第二节 生态主义运动的产生	—	34
第三节 生态主义由“浅”入“深”	—	43
第四节 绿党的诞生及其政治影响	—	62
第二章 西方生态主义的基层民主理念	—	73
第一节 政治的基层民主	—	74
第二节 经济的基层民主	—	99
第三节 政党的基层民主	—	113
第三章 西方生态主义的非暴力政治参与理念	—	119
第一节 非暴力和平主义信念	—	119
第二节 社会变革的非暴力途径诉求	—	134
第三节 政党及其活动的非暴力政治道德	—	137
第四章 西方生态主义的生态优先和社会正义理念	—	144
第一节 生态优先	—	144

2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第二节 社会正义	—— 164
第五章 西方生态主义的和平主义国际交往理念	—— 174
第一节 国家安全新维度	—— 174
第二节 世界和平新秩序理念	—— 182
结语	—— 200
主要参考文献	—— 220
后记	—— 233

引言

使人惊心甚至战栗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成为显象,人类前所未有地共同面临同一问题——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令人心头时常萦绕类似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的忧思。生态问题是人类生存之本的问题,是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如果说政治的应然性根本职能(至少是职能之一)是公正地维护每个人(与群体)的利益的话,那么生态问题便是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这不仅因为解决生态问题离不开政治,也因为生态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会渗入政治之中。^①由此也给政治带来了不可回避的新要求或挑战。西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正是建基于对此问题的思索与化解危机的探求之上的。

化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然而,由于认识的不同,对化解这一危机的路径便有了“治标”与“治本”的分野,这也就是所谓西方生态主义学理上的“浅生态”与“深生态”对化解危机的不同。但这种所谓不同,也许并不像西方生态主义自认为的那种进步与落

^① 科尔曼认为:“社会与环境问题不能孤立地解决,问题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的公共制度、我们的私有企业和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Daniel A. Coleman. *Ecopolitics: Building a Green Societ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参见[美]丹尼尔·A. 科尔曼. 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梅俊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91.

后的严格分野。

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始,由关注环境的由“浅”入“深”的发展,实现了对“环境主义”的深化,形成了今天在西方甚至全世界颇有影响的生态主义政治思潮。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讲,要化解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仅从治标层面关注自然环境的治理是没有出路的,而必须深刻认识引起这一危机的深层社会根源,并从改造社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入手才可能找到真正出路。随着西方生态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各国成立的绿党成为一支具有全新意义的强大政治组织力量,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优先、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的“四大支柱”原则,它将人类社会政治推进到对自然生态的深层关注。如果我们说传统政治学是以群己权界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学说,那么,西方生态主义政治学则在此基础上将之进一步推进到人类与自然之权界的领域,开拓了政治的新境域。然而,由于自然界作为政治主体或政治主体性关照的特殊性,这既体现出西方生态主义政治学的特色,也是它解决其涵旨所面临的难题,无疑也对传统政治学提出了全新的重大挑战。

当今世界,资本的扩张渗透于种种制度或主义之中。有人称自由主义为自由资本主义,也有人称民族主义为民族资本主义,亦有人称社会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资本扩张在各种社会制度内及各种制度之间的争斗导致血腥、战争、屠杀、征服、统治、奴役等等不一而足的灾害现象,甚至是或可导致人类不可持续的生态灾难的悲剧结局。资本的扩张性的逻辑演绎淹灭了人伦或使人伦错乱,它极其险恶地刺激起人们的无止贪欲,正是由资本主义激起人的贪婪性并推行弱肉强食、落后挨打的丛林法则,推动了当今的全球化。这种资本主义无限追求物欲的疯狂逻辑激发了人们谋求物质利益的高明手段——高新技术,但同时也导致了异化消费,颠倒了人伦,使人不是为了止饥而求食,而是为了迫使人们求食(购买商品)而制造饥饿(需求);也犹如不是有了创伤而用金创膏,而是为了能涂敷金创膏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资本扩张的逻辑演绎导致技术官僚与大财团对国家的控制,而技术官僚与大财团

这只掌握着高新技术的巨手,把一切被高新技术边缘化者(个人、群体或国家)当作捕鱼的鸬鹚鸟。操控者在鸬鹚鸟的颈上套上高科技精密控制的牢固项圈,使其只能吞下小鱼小虾而始终处在半饱还饥的状态,而操控者就用小鱼小虾作诱饵使他们拼命劳作,而捕捉到的大鱼却被控制其命运者占有,否则甚至要被饿死。资本主义这部全球化的令人惊奇的机器正是从这种不公正的颠倒的人伦——在为了剥削和宰割他人与在摆脱落后挨打的恐惧中争先恐后——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力能,但它却“根本就没有方向盘,也无任何内部调节器来控制速度和方向,它完全凭自己的习性和自身向前的动力支撑,向前加速奔跑”,但前面显然是由鼓励资本无限扩张而激起的人的无尽的物欲挖掘的无底深渊——社会不公与生态危机的深渊。

在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资本的扩张性导致的对人类“外部”——自然界——的掠夺带来的危害最终必然凸显甚或会由于历史的惯性而难以扼制。然而,自然界并非人类真正的外部世界,它实质是人类生存的根基,是人类的真正寄托所在。对自然界的破坏就是毁灭人类自身的未来。而这种灾难不幸已被人类在相当的程度上变成了实在。承载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对财富(资本)的欲望与追求是无限的。正是这一矛盾使人们为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厮打得如此惨烈,也正是“资本既撕碎了传统的文化习性,又在重新凝聚或重组文化的传统特性,进而出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层面交织的断裂”^①。既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社群主义皆与资本及其扩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对此作出彻底性反思的主体就必然旁落。这也就是说,上述诸种主义由于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们都无法割断与资本扩张利益关联的脐带,不可能对其进行彻底的反思,更不可能对资本扩张性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否弃。也即彻底反思现存政治与资本扩张的关系,遏止资本扩张性及其带来的危害,弥补裂隙,回

^① 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第五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10.

归本真,改变现存生产生活方式,维护或不侵犯自然界的权利从而最终维护人类的最根本利益——人类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然要求出现对于上述诸种主义来说是全新的主义。于是,这就成为应时势而生的新的主义——生态主义——的生态政治追思的独特的深层关照。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的这种深层关照的未来成就的前景不能说是十分明确的,但它对传统政治的挑战,无疑引发了各种主义的不可避免的新思考,打破了传统政治的局限,注入了新的内涵。西方生态主义围绕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在新的政治理念思维下,对传统政治的各主要领域进行了新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审视,拓展了政治领域的视界,使政治发展有了一种新向度。

西方生态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即政治的”^①。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H·Marcuse)也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完全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②。生态问题既是小政治,面对它每个人都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同时它又是大政治,它不仅要求人们要有放眼全球、着眼全局的高瞻远瞩的宽广胸怀,更要求人们必须既能深谙自身历史的来路,也能洞察自身发展的未来——人类自身行为对未来的影响。这种大政治要求人们必须认清我们从何处来,又究竟该向何处去。人们必须放慢过于匆忙甚至是狂奔的脚步,带着凝思,思考再思考,思考我们来自于其中并且始终无法摆脱,更确切地说是须臾也离不开的生态环境: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与之相伴?在自然的力量下被赋予了能动性和智慧的人,该怎样发挥他的能动性,他的智慧是否真如他自信的那样超越了赋予他智慧者——自然——的智慧?他果真能够征服、战胜及至统治赋予他力量与智慧者——自然——吗?他的目标,是选择了永续、永存还是

^① 这是生态主义借助西方妇女运动的宣言。参见[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77.

^② [美]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8,129.

选择了疯狂、沉沦甚至死亡？这些问题也许在“启蒙”延续的狂飙突进式的岁月里会被认为是荒谬的。但到了今天，只要人们环顾一下四周和我们身在其中的生态环境态势，大概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起码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警示。

如果真正值得警醒，那么仅仅在浅层生态上保护环境，简单地营造局部的所谓“绿色”，就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从根本上思考人类究竟应该怎样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保持人的永续发展。答案不可能是现成的，就是去寻求也不可能轻易可得的。但人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刻不容缓地进行思考与探索，并且逐渐深入。探索的过程包括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操之过急却绝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它需要韧性的坚持。并且它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只有这样才有望获得好的结局。

许多先觉者已经作出了可喜的探索，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理论或方案显然不是最后的真理。既然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除非是神或兽才可能脱离政治。那么，把握或解决人类未来前程的问题——今天较集中地表现为生态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持久的问题之一。莫斯科维奇也认为，“当今时代，自然问题处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①。是故，本书即基于上述因素，对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与政治发展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产生于生态运动之中，而它一经产生，便对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反过来政治的发展又对生态运动（问题的解决或趋向）产生影响。那么，人们应该怎样认识和把握这种互动，就显得意义重大了。

西方生态主义作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是由生态灾害和能源危机直接引发的群众性抗议运动。经过 70 年代的不断扩展后，西方生态主义运动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达到一个高潮。随着

^①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 [M]. 庄晨燕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35.

6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西方生态主义运动深入而发展的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的经济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准则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的发展脉络、基本主张及它在当代西方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对于全面把握和理解当代西方及至整个世界的政治进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然,并非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生态可持续的未来的真理或“钥匙”,也不能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建设性潜力。事实上,只有对西方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入的研究分析,才有可能为构建和谐与可持续的文明(包括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现实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借鉴。

在当前我国面临比较严峻的环境问题的情况下,西方生态运动所展示的作为一种可选择的道路或可借鉴的模式,其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膨胀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加剧,全国上下,各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日益完善,并且在《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被认为是“下个世纪和未来国家发展的自我需求和必然选择”。在社会层次上,普通公众的环境意识以及对于环境保护的参与水平也得到了增强。可见,生态运动的兴起和生态主义政治理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深切期盼并努力付诸实践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既要避免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失语,又要反对有可能的西方生态话语霸权与防止生态环境侵害转嫁行径等。加强国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合作、切实履行国际环保义务、维护国家利益也显得尤为重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也是我国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时的理论坐标。

可见,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吸

收借鉴其有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少走弯路,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正确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本书所涉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1. 研究现状

当代西方生态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一种政治思潮或一种意识形态,其历史至今不过仅 30 几年的时间,但由于其抓住了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生存的最根本利益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对其的研究从总体来说仍处于粗浅状态。西方生态主义政治思想实际经历了从“浅绿”到“深绿”的发展过程,与此相伴而产生的生态主义相关理论分为原创理论与研究理论,而其发展也像生态主义本身一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反映问题的程度看,原创理论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环境破坏问题关注的浅生态理论著述,如 R ·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W · 安德森编的《政治与环境:关于生态危机的读物》(1970);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等。另一类是探寻生态危机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所谓深生态理论著述,如 T · 罗扎克的《个人与星球》(1978);L · 布朗的《建立可持续的社会》(1981);A · 阿特金森的《政治生态学的基本原理》(1991);米歇尔 · 贝根(Michael Begon)等的《生态学:从个体到生态系统》(*Ecology: From Individual to Ecosystem*) (2006)等。

还有就是大量的对西方生态主义或绿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的著述,如 A · 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1990)和《绿色政治读物》(1991);T · 黑沃德的《政治理论与生态价值观》(1998);R · 凯尔等的《全球和地方的政治生态》(1998);J · 巴瑞的《重新思考绿色政治》(1999);约翰 · 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2008);斯图亚特 · T. A. 皮克特等的《深入理解生态学:理论的本质与自然的理论》(2009);欧内斯特 · 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2010)等。

上述各类研究中,尤以舒马赫的《小即为美》(1973)、《德国绿党宣言》(1983)、波利特的《理解绿色政治》(1984)和斯普雷纳克与卡普拉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1986)影响最大,具有经典性意义。

欧洲各国的绿党成立以后,大量的对绿党的研究著述逐渐涌现,这类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各国绿党历史发展及纲领政策演变的介绍、分析;另一类是关于绿色政治理论和价值观的探讨;再一类是侧重于绿党对当代政治影响方面的探讨。

绿党的崛起对欧洲的政党竞争和政治经济议程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有关欧洲政党政治的著述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还对此做了专题性探讨。如 1986 年福斯(D. Foss)和拉金(R. Larkin)出版的《超越革命:社会运动的新理论》(*Beyond Revolution: A New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1990 年达尔顿(R. J. Dalton)和屈希勒(M. Kuechler)的《挑战政治秩序》(*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1992 年罗宾森(M. Robinson)的《英国政党政治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 ;1994 年卢兹(C. Rootes)和戴维斯(H. Davis)的《新欧洲?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A New Europe?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99 年沙尔(Tad Shull)的《重新界定红与绿》(*Redefining Red and Green*) ;2002 年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的《欧洲执政绿党》(*Green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生态运动兴起后社会革命主题的转换以及绿党对其他传统政党的冲击和影响,揭示了当代政治经济进程的绿化过程。

而对第二类问题,即有关绿党哲学基础和政治理论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1990 年多布森(A. Dobson)的《绿色政治思想》(*Green Political Thought*) ;1992 年古丁(Robert. E. Goodin)的《绿色政治理论》(*Green Political Theory*) ;艾克斯利(Robin Eckersley)的《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对生态中心论的探讨》(*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 1993 年佩珀 (David Pepper) 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 费里斯 (J. Ferris) 编辑出版的《绿色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德国社会运动与生态改革》(*Realism in Green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 and Ecological Reform in Germany*) ; 1994 年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凯利 (Petra Kelly) 的《绿色思考》(*Thinking Green*) ; 1994 年丹尼尔 · A · 科尔曼 (Daniel A. Coleman) 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Ecopolitics: Building a Green Society*) 等。这些著作有的对各国绿党的思想主张作了较为客观的论述,有的则表达了绿党不同派别的倾向,尤其是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不同思想主张。

对各国绿党历史发展及纲领政策演变的研究成果也许是最多的一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早期研究中,学术界一般主要把目光对准德国绿党。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绿党是欧洲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广的绿党。另一方面是德国绿党中不乏一些绿色理论家,他们著书立说,积极宣传绿党的各项政策主张。如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巴赫罗在 1982—1986 年间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幸存者》(*Socialism and Survival*)、《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Socialism, Ecology and Utopia: An Interview*)、《由红到绿:与〈新左派评论〉的对话》(*From Red to Green: Interview with New Left Review*)、《建造绿色运动》(*Bulding the Green Movement*) 等文章和著作。这些著述使德国绿党成了绿色政治的一个窗口,人们主要是通过德国绿党来了解生态运动的走向和主张。对德国绿党作全面介绍的早期著作有: 1984 年美国学者卡普拉 (Fritjof Capra) 和斯普雷纳克 (Charlene Spretnak) 所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Green Politics: The Global Promise*) ; 帕帕达基斯 (E. Papadakis) 所著《联邦德国的绿色运动》。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前半期,有关德国绿党的著述进一步增多。如 1988 年英国学者赫尔斯勃格 (W. Hulsberg) 所著《德国绿党:社会政治概览》(*The German Green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file*) ; 1989 年英国学者克林斯基 (E. Kolinsky) 所著《联邦德国绿党:组织与决策》(*The Greens in West Germany: Organization and Policy Making*) ; 1992 年美国学者吉恩一弗兰克兰 (Jene -

Frankland) 和休恩梅克 (D. Schoonmaker) 所著《抗议与权力之间: 德国绿党》(*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The Green Party in Germany*) ; 1993 年德国学者拉施克 (Joachim Raschke) 所著《绿色党人: 他们的演变与现状》(*Die Grünen. Wie sie wurden, was sie sind*) ; 1994 年英国学者沙夫 (Thomas Scharf) 所著《德国绿党: 对共识的挑战》(*The German Greens: Challenging the Consensus*) ; 1997 年斯普雷纳克 (Charlene Spretnak) 所著《真实之复兴》(*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 1998 年迈尔 (Margit Mayer) 和伊利 (John Ely) 所著《德国绿党: 运动与政党悖论》(*The German Greens: Paradox Between Movement and Party*) 等。在这些著作中, 以拉施克的《绿色党人: 他们的演变与现状》最具权威性。在这部长达 959 页的著作中, 详细论述了德国绿党的历史发展, 不同地区的差异, 党的组织结构, 绿党与其他政治团体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①

在西方生态主义政治中还有两类著述, 一是对生态危机局面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 N · 迈尔斯的《最终的安全: 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1993) ; 迈克尔 · T · 克莱尔的《资源战争: 全球冲突的新场景》(2001) 等。另外则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量产生的环境伦理著述, 包括众多版本的生态伦理学著作和概论著作。如霍尔姆斯 · 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2000) ; 戴斯 · 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2002) ; 布赖恩 · 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1999) ; 等众多著述。

此外, 对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也构成了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的独树一帜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著述也相当丰富, 如代表作有 D · 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2) ; J · 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 ; J · B · 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 ; S · 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2008) ; 等等。

西方学者对生态主义政治的研究虽然是多方位和较深入的, 也为我们认识这一新的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丰厚的资料, 但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①对

^① 参见刘东国. 绿党政治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5 ~ 6.

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的研究显得零散而表浅;②西方生态主义各派别的政治理念和相关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分歧未能得到较有说服力的解析,因而仍未达到相应高度的共识;③对生态伦理的核心性概念的探求仍未取得应有的成功,因而影响生态主义政治理念对指导人们实践的有效性;④由于西方生态主义的参与型基层民主理念仍未能得到科学的系统性阐述,因而未能取得克服新民主模式困境的应有成就。

我国学者对西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也进行了研究,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著述,但相对于生态(危机)等相关问题的严峻性及其极需理论借鉴而言,仍显得较薄弱。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有(以下所列均为论著):余谋昌教授著有《生态学哲学》(1991);毛文永教授和文剑平教授合著《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1993);李章印教授著有《自然的沉沦与拯救》(1996);余正荣教授著《生态智慧》(1996);李泊言教授著有《绿色政治——环境问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1999)。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对西方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主要特点:一是以研究和介绍西方政治思潮(含西方生态主义)及其发展历史为主。这主要见于各种版本的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或思潮研究文献的章节之中,如徐大同先生总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2005);陈林教授和侯玉兰教授共同撰写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1998);周穗明教授等著的《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2001);段忠桥教授的《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第二版)》(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匡萃坚教授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05)等等著作中。二是以研究、介绍西方新社会运动(含西方生态主义)及其思想和历史发展为主,如奚广庆教授和王谨教授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1993)。三是以研究和介绍西方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及其实践模式的探索为主。如雷毅教授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2001);郇庆治教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2007)。四是以研究和介绍西方各国绿党为主。如郇庆治教授的《欧洲绿党研究》(2000);刘东国教授的《绿党政治》

(2002)。五是从环境问题决策角度和对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如肖显静教授的《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2003);林红梅教授的《生态伦理学概论》(2008);另外,卢风教授的研究角度比较独特(《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2009),是属融贯中西而成一家之言的那种著述,但也大体是属于生态伦理学的范畴。还有就是近年来出现大量的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著述有:郇庆治教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1994)、《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1998)和《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0);刘仁胜教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教授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郭剑仁教授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08);孙道进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2008);时青昊教授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2009);王雨辰教授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倪瑞华教授和王雨辰教授合著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文献。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生态政治的发展进程和一般特点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但相对于生态政治丰富的内容和深远的影响来说,研究还必须继续深入。在上述的研究成果中,尤其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则更少,而多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欧洲绿党发展史的介绍和研究,虽然这也必然要涉及生态政治及整个西方政治的发展,但作为一种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新政治思潮,仅从政党学的角度进行认识和研究显然是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入的。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将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对当代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与政治发展的互动或关联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西方生态主义有了自己的生态优先、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四大支柱”原则或核心理念,由此将人类社会政治推进到对自然生态的深层关注,推进到对自然的主体性关照或人类与自然之权界的领域。本书对